

数字人文视域下汉文佛典英译史的特征、困境与建议*

张政 王 贇

【摘 要】汉文佛典不但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宝藏，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佛教发端于古代印度，经由翻译这一途径，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又随译本传播至英语世界。英译本汉文佛典珍贵文献出版量较少，加之年代久远而多有散佚，导致此类文献记录稀少，仅散见于佛学研究和佛教修行机构网站，难以呈现汉文佛典英译史的整体面貌。目前，学界对佛典英译关注度低，成果有限且缺乏系统性，该领域的知识体系和学术定位亟待明确，以与其重要的文化价值相契合。本文基于数字人文理念，整理 1831—2023 年出版的 1206 种汉文佛典英译本信息，将出版趋势、部类分布和译本数量等特征进行可视化呈现，对翻译路径、版本体系和出版媒介等方面的现状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中华典籍对外传播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关键词】汉文佛典 英译史 数字人文

【作者简介】张政，文学博士，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贇（通讯作者），文学博士，太原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5) 03 - 0019 - 17

佛教发端于古代印度，自汉迄隋唐，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佛教本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数据库构建与传播研究”（22YJC740081）、国家语委科研基地暨国家语言文字智库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项目“基于传播数据库的《六祖坛经》多语种话语体系建构研究”（WYZL2023SX0011）的阶段性成果。

土化进程中，形成了以汉文佛典为载体、以大乘佛法为核心的佛教思想体系。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①中国古代的译经、解经与崇经，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创宗立派等活动，推动佛教思想与实践方法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②佛教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关键在于佛教的中国化推动形成了一种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的宗教哲学。汉文佛典包括翻译典籍和中国撰述两类：前者指中国人翻译的从域外传来的佛教大小乘典籍，主要译自自古印度梵文和中亚地区文字撰写的佛教经典；后者指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包括经典注疏、史籍僧传、总集类书、经录音义、灯录语录等。^③自20世纪以降，胡孚琛和方广锜、蒋平、常亮等呼吁学界正视汉文佛典的重要价值并展开深入研究。^④汉文佛典对外传播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独特的推动作用，而佛典的英译与阅读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哲学的体认。^⑤本文通过分析出版趋势、部类分布、译本数量等关键数据，揭示了汉文佛典英译的整体特征。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困境提出了对策建议，为汉文佛典英译研究提供支撑，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数字之维：汉文佛典英译史特征

公元4世纪，佛教一度为亚洲带来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公元6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仅有少量梵文佛典写本留存于世，成书年代多晚于汉文译本。此后，汉文佛典又随英译本的传播走进西方世界。不过，汉文佛典英译资源仅散见于佛学和佛教机构网站，出版物印刷发行量较小，并且

①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巴黎）》，《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② 参见李利安、田鹏：《从文化关系的变革看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五台山研究》2024年第2期，第13页。

③ 参见魏道儒：《中国汉文佛教典籍》，《百科知识》2009年第20期，第47~48页。

④ 参见胡孚琛、方广锜：《道藏与佛藏》，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蒋平：《汉语佛典在美国的英译及现状研究》，《上海翻译》2021年第2期，第46页；常亮：《汉传大乘佛教经典英译的历史与方法》，《法音》2022年第2期，第33页。

⑤ 参见许文胜、刘朋朋：《汉语佛典在英语世界的百年译介——历史语境、主体与模式》，《上海翻译》2023年第1期，第78页。

因年代久远而佚失。有鉴于此，本文综合考察汉籍、佛典英译书目、相关论文及 WorldCat 全球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Amazon 图书销售平台等电子资源，从中提取汉文原本和英译本数据，以数字人文方式呈现汉文佛典英译史的演变脉络。

（一）多重数据来源交叉验证

数字人文可视化的优势在于可将大量复杂的数据信息以直观易懂的方式呈现，即便面对汉文佛典英译书目信息之类的庞大数据集，研究者也能迅速从中提取有效信息，探究其中的规律。笔者自建数据库^①的汉文佛典英译信息来自多种文献书目，如《汉籍目录便览》（*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大乘佛教文本译入西方语言书目导览》（*Mahāyāna Texts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Language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中国宗教：西方语言文献》（*Chinese Religions: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书系》、《中国汉传佛教经籍西文译本书目：1831—2017》等，以及汉文佛典西方语言译本书目网站。本文以最新成果为参照，交叉比对多种来源数据，统一译者署名、书名大小写等体例规范，确保录入数据的准确性及修正记录的可回溯性。

美国天普大学副教授马德伟（Marcus Bingenheimer）收集的文献目录以《大正新修大藏经》目录为基础，将已译为西方语言的佛典书目整理发布于互联网^②，共收录 1106 个英译佛经版本。相较而言，笔者自建的汉文佛典英译数据库聚焦被西方学者忽视的在中国本土出版发行的中国译者作品，并且专门搜集汉文佛典英译本书目，所涉信息节点更为细密。目前，该数据库已收集 1206 条英译本信息，分为 15 类节点，包括中文底本名称、所属部类、所属宗派、英译本名称、所属丛书/合集名称、译本类型（全译、节译、编译）、英译者姓名、英译者国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出版社类型（学术机构、佛教机构、综合）、版本信息（再版、重印、转译）、出版载体（书籍、期刊、学位论文、网页、电子书、音频）和备注（信息来源、存疑之处）。本文从数字人文视角梳理汉文佛典英译史，通过对出版趋势、部类分布、译本数量等关键信息进

① 笔者自建的汉文佛典英译数据库涉及上千条数据和多维分析运算，如需了解更多细节，可与笔者联系。

② 参见 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nto Western Languages, <https://mbingenheimer.net/tools/bibls/transbibl.html>,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行多维度统计，并结合社会历史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揭示汉文佛典英译史的基本特征。

（二）多维分析提炼译史特征

1. 出版趋势折射翻译动机

最早的汉文佛典英译记录可追溯至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查尔斯·弗莱德·纽曼（Charles Fried Neumann）撰写的《沙门教义问答集：中国佛教僧人修行律仪》，其中包含律学著述《沙弥律仪要略增注》的英译本。

在近200年的汉文佛典英译历程中，已有578部汉文典籍被译为英文，约占此类典籍总数的10%。同经异译现象普遍存在，英译本共有1206种，其中可查明准确出版年份的有1120种。汉文佛典英译的出版特征为“前少后多”，从1831年首部英译本出版至20世纪初，英译本数量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译本数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在1938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有5部汉文佛典被译为英文；此后，英译本数量有所波动，但仍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近七成英译本的问世集中于1980年后，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译本数量显著增长，2012年更是高达47部（见图1）。这表明汉文佛典英译出版活动越来越密集，汉文佛典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持续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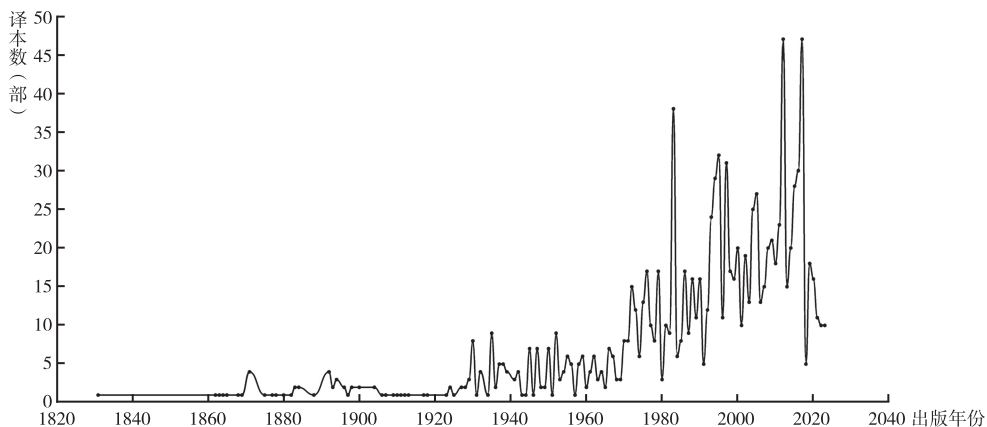


图1 汉文佛典英译本出版特征（1831—2023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最早被译为英文的汉文佛典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经部经典，涵盖般若部、法华部、涅槃部、经集部、中观部、宝积部、阿含部，如《金刚经》《心经》《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大乘起信论》《首楞严三昧经》《大般涅槃经》，为汉地本土宗派佛典英译创造先行语境；第二类是律部经典，如《沙弥律仪要略增注》《四分律比丘戒本》《善见律毗婆沙》；第三类是史传

部经典，如《高僧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婆薮盘豆法师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汉文佛典英译的最初 100 年内，英语世界读者关注的重点是大乘佛教基本义理、佛教僧侣的戒律和仪则，以及依据古代高僧游历见闻做的史地记录。在西方学者看来，汉传佛教的独特价值并非建立在佛典原义的基础上，而在于其赋予世界文明史的思想新义。佛教在欧美的传播既是东方国家移民将原住国宗教带入西方的结果，也与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宗教的行为有关。^① 翻译动机的差异源自译者身份的差异，佛教研究和传法修行等动机兼而有之，这导致文化传播与话语建构的路径呈现多样化格局。

汉文佛典英译的发展历程与各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紧密相关。1831 年德国东方学家纽曼的开创性翻译，反映了 19 世纪的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和宗教的兴趣。早期翻译的汉文佛典多是阐释大乘佛教核心教义、佛教僧侣戒律以及记载佛教历史和地理的文献，这与当时西方学者试图通过文献了解异域文化和宗教的需求密切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英语作为国际交流语言的普及，西方对汉文佛典的英文翻译需求显著增加。翻译动机的差异导致了佛典翻译工作取向的差异：早期西方学者和传教士开展翻译活动的目的在于进行文化比较和学术研究，而后期译者的文化背景趋于多元化，更注重佛教原义的传达与文化传播。不过，目前汉文佛典英译本的数量仍然有限，说明佛典翻译难度较大且专业翻译人才匮乏，这也是该领域存在的一个短板。

2. 部类分布揭示文化选择

佛教典籍包括经藏、律藏和论藏三藏，以及各种佛教著述，古代称“众经”“一切经”，现称“大藏经”。本文参照《大正新修大藏经》的部类划分，对现有英译本进行分类统计：经藏包括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 10 部；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祇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菩萨戒等；论藏包括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 5 部；杂藏包括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目录 8 部；其他藏经系统收录而《大正新修大藏经》未收录者标注为“其他”。在英译本中可判明所属部类的 1161 种典籍，主要分布于经藏（573 种）、论藏（105 种）、律藏（30 种）、杂藏及其他（453 种）（见图 2）。

综观汉文佛典英译本的部类分布，诸宗部（含续诸宗部）和经集部译本最多。诸宗部主要是汉传佛教各宗派的著述，包括大乘义章类、三

^① 参见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净土宗和禅宗等。经集部是经类合集，包括《四十二章经》《十善业道经》《维摩诘所说经》《入楞伽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佛说盂兰盆经》《解深密经》等重要经典。值得注意的是，诸宗部中的禅宗典籍英译本共有158种，占诸宗部英译经典（275种）的一半以上，超过其他部类译本的总数。禅宗经典在英语世界受到更多关注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在20世纪50年代，禅宗在英语国家已较为流行，多所著名大学设有研究禅宗的机构或团体，大批禅宗信徒前往英语国家的禅宗寺院朝拜和修禅，并相继创办禅寺、禅堂、禅宗学校和研究中心等机构。经过西方文化改造的“禅”逐渐为西方大众熟知并接受，其中承载佛教术语的语言文字是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它强烈反构着文化，潜在地规定着文化中诸多分支的发展路向。这些佛教概念伴随着研究或修行活动进入英语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文佛典英译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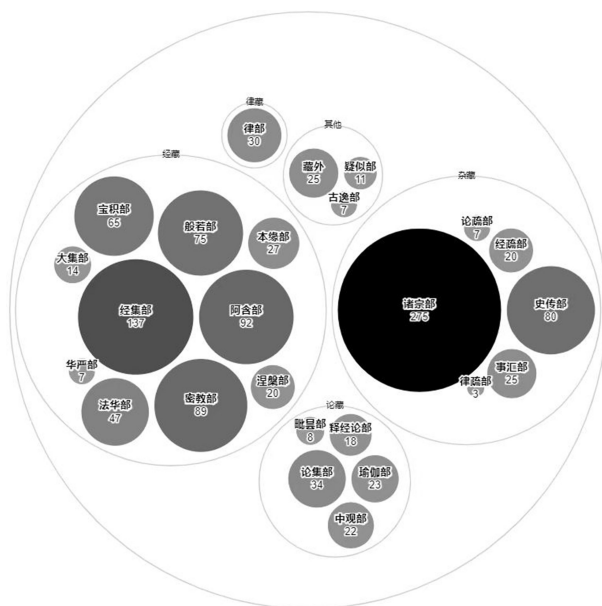


图2 汉文佛典英译部类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汉文佛典英译部类分布的不均衡，反映了译语文化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西方人士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好奇和追求，导致承载中国佛教核心理念的经集部佛典受到重视。诸宗部和经集部译本数量丰富，尤其是禅宗典籍英译活动频繁，这与禅宗在西方的流行密切相关。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禅宗以其独特的冥想实践和生活哲学吸引了西方世界的目

光。众多研究机构和团体的成立以及禅宗寺院的兴建，为禅宗经典的翻译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文化对“禅”的选择性改造和解读，不可避免导致对原意的偏离。这种文化选择性表明，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且是文化互动、社会需求和历史语境共同作用之下的行为。

3. 译本数量呈现长尾分布

单部佛典对应的英译本数量差异较大，少数重要经典的译本多达数十种，而多数经典仅有一种译本，这符合长尾分布特征。禅宗一系有多部经典排在译本数的前25名，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以下简称《六祖坛经》）、《景德传灯录》、《永嘉证道歌》、《信心铭》等。这是因为禅宗根据“自性本清净”之说，宣说“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基本思想^①并且提供可操作的修行实践指导，再加上禅宗海外弘传影响深远，所以使英译本的翻译和接受有了实体依托。

在英译本排行榜中，重要经典的英译本不仅最早译出，而且后续多次复译。《六祖坛经》有31种英译本，在完全依汉文佛典译出（不参考梵文、藏文、巴利文）的典籍中是英译本数量最多的。译本在10种以上的典籍多出自经藏，仅《弘明集》属史传部。而在经藏中，除了小乘阿含部经典以及统摄大小乘的《四十二章经》，译本数最多的经典皆属大乘。《金刚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属般若部；《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属阿含部，合称四阿含，此部类多为节译；《阿弥陀经》《大宝积经》属宝积部；《维摩诘经》《四十二章经》属经集部；《妙法莲华经》属法华部（见图3）。大乘佛教经典的英译优势明显，这与西方学术传统相关。最早被译介到欧美的是梵文佛典，其中那些蕴含东方古典智慧的佛典引发了学界关注，生死轮回、般若智慧等概念继而引入西方大众的视野，为汉文佛典英译提供了知识准备。

近年来，有译者将知名度较低的经典译为英语，如经集部的《佛说无垢贤女经》和《佛说阿阇世王经》以及密教部的《佛说安宅神咒经》等。这些经典的翻译多由学术研究驱动，学者以翻译为研究手段深入挖掘佛经的文化内涵，分析佛教思想在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演变过程。

汉文佛典英译本的分布特征，反映了译语社会对文化产品供给的影响。《六祖坛经》等禅宗文献之所以翻译率高，是因为禅宗思想与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契合，这种内在需求推动了文献的翻译和流通。大乘佛教经

^① 参见王贇：《〈六祖坛经〉英译话语建构研究》，外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2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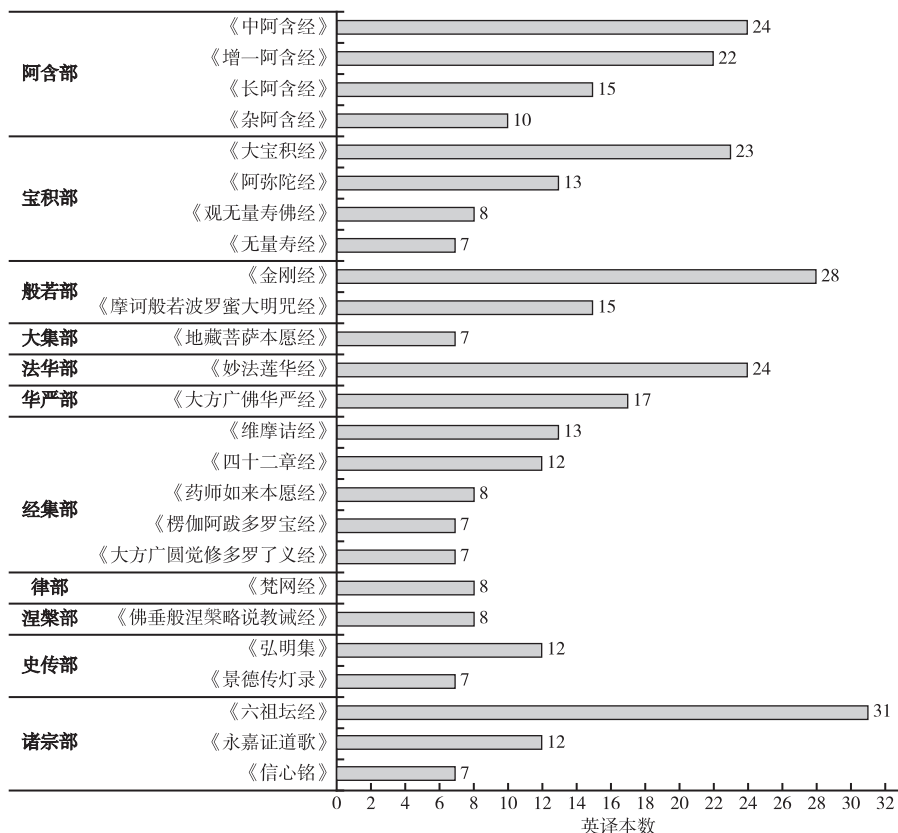


图3 汉文佛典英译本数排行（前25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典的英译优势与西方学术界早期对梵文佛典的关注和研究有关，这些经典中蕴含的东方智慧已逐渐融入西方的文化和知识体系。近年来，尽管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佛典也逐渐被翻译，但这主要是由学术研究驱动的，反映了学术界对佛教思想深层次挖掘的需求。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佛典译本的传播受制于源文化的内在价值，并受到目标文化市场需求、学术兴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二、人文之思：汉文佛典英译的现实困境

佛典英译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鉴提供了路径，而绵延千年的佛典汉译活动也可作为遥相呼应的翻译史参照系。借鉴佛教关于世界生灭变化的“成住坏空”思路，将两段翻译史置于初始期、发展期、繁荣期、

衰退期的过程中进行对比，可以观察翻译活动中的异质文化在跨语言语境中的产生、发展、成熟、衰落、消亡等环节。佛典英译活动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但与古代佛典汉译的盛况相比，现代佛典英译在规模和系统上仍显薄弱。古代佛典汉译活动长期影响中国佛教发展，推动佛教理论融入中华主流传统文化，佛典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在去印度化的同时实现了中国化。近现代汉文佛典英译与古代佛典汉译的历史背景差异较大，二者的发展过程既有相似性，又有各自的特点。^① 相较古代的译经活动，现代社会翻译和出版的效率虽已极大提升，但根据目前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和宗教状况分析，像古代中国那样的中央政府重视并大规模资助佛经汉译的盛况恐难再现，佛典英译实现规模化、飞跃式发展的可能性较低。

（一）译入与译出路径话语影响不均衡

汉文佛典英译路径的界定以译者母语身份为参照标准，译入路径是译者将佛经从非母语译至母语（目标语为译者母语）的途径，译出路径是译者将佛经从母语译至非母语（源语为译者母语）的途径。译者的母语身份是翻译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影响翻译质量和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在汉文佛典英译本的跨文化传播中，译入和译出路径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在佛典英译的最初 100 年间，英语母语译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后的发展期，汉语母语译者有所增多，但人数依然极少，译出路径在全部英译本中的占比不足一成。

在汉传佛教刚传入英语世界时，译入路径的译本数量较多，影响力较大，这一现象与英国的宗教多元化和对东方宗教的学术兴趣有关。佛典英译工作由英国传教士开启，代表性人物包括理雅各（James Legge）、艾约瑟（Joseph Edkins）、毕尔（Samuel Beal）、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② 其中，李提摩太与杨文会合作翻译

① 本文以 1930 年作为发展期的起点，盖因黄茂林的《六祖坛经》英译本于 1930 年出版，是首个由中国译者译出的汉文佛典。1930 年之前的英译本均为英美或日本译者翻译，多从古印度佛教经典汉文版译为英文。另有学者提出 1929 年吕碧城英译了《法华经·普门品》并以英汉对照本刊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英国学者克尔恩（H. Kern）依照梵文经本翻译了英译本《妙法莲华经》，吕碧城依照该英译本回译成汉文本，并且补充了其他中译本缺漏的部分偈言。该书由上海佛教书局于 1943 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合璧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英文）。参见姚腾：《释家典籍英译研究现状评析——兼论典籍英译研究对象的“失衡”现象》，《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第 133 页。

② 此为按译者出生年份排序：理雅各（1815 年）、艾约瑟（1823 年）、毕尔（1825 年）、李提摩太（1845 年）、苏慧廉（1861 年）。

的《大乘起信论》最为知名，李提摩太的翻译风格被称为“洋格义”，即将基督教观念用于对译佛教术语。^① 这些传教士的工作促进了佛教思想的国际传播和西方汉学的发展，在译入路径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奠定了基础。其不足之处在于，传教士难免因身份所限曲解佛教思想，如李提摩太将大乘思想视作披着佛教外衣的基督教。^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精通佛理和双语的汉语母语译者逐渐增多，在佛经英译的译出路径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开中国译者英译汉文佛典先河的是黄茂林，他于1930年在上海译出宗宝本《六祖坛经》，后续出版的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韩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黄泽思（Tze-si Huang）、余松译本皆基于该版本改编。黄茂林的英译本后来还被转译为德语版、意大利语版、荷兰语版、丹麦语版、西班牙语版，并衍生出绘本、歌曲和读诵版。这既显示了黄茂林首译本经久不衰的跨语言影响力，也标志着翻译质量的显著提高和文化传播的持续扩展，可能与西方世界对佛教经典的学术兴趣和宗教需求有关。最近50年，西方各国虽出现了汉传佛教翻译团体，但规模较小，每个译场所译经典数量有限，而且缺乏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文化环境的培养。这与中国古代佛经汉译时期由国家资助的大规模译场形成了强烈反差，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佛经翻译重视程度的差异。

（二）汉文底本与英译本的版本谱系不明晰

与梵文及其他文字的佛典底本不同，汉文佛典英译属于接力翻译（relay translation），先由古代印度及中亚文字译为汉文，而后汉地祖师又生成原创性论述。这些转译经典和原创经典从汉文向英文译出，不可避免会形成多重转译和版本交错的情况。

初始期的英译本多为零散节译，发展期的英译本初具系统性，但佛典体系仍未明确，多由译者自行选择，缺少协调组织和全局安排，这一现象与目标语国家政府对翻译活动的消极态度密切相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佛经汉译本自东汉明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统治阶级或为佛教提供政治护佑，或因自身信仰积极推动佛教传播，佛教僧众则顺王权之势，持续译经弘

① 参见常亮、曹顺庆：《话语之“筏”：论“格义”与“洋格义”》，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1页。

② 参见杨靖：《上帝的回音——李提摩太对中国大乘佛教的解读》，《基督教文化学刊》2022年第2期，第150页。

法，^①足见国家作为赞助者的影响之深刻。

西方对汉文佛典的翻译多源自民众自发的文化需求，而民众对英译本对应的中文本源头并不关注。初始期的英译本出自45部佛经，多为由古代梵文或中亚文字汉译而成的大乘经典，以及中国佛教祖师撰写的史传部经典，而非承载汉文佛典义理思想的诸宗部。这些最早的英译佛典将般若、空性、佛性、不二等思想引入英语世界，为禅宗文化进入英语世界提供了前置条件，体现了佛经翻译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汉文底本与英译本的版本谱系不明晰，反映了其背后的两种文化在佛经翻译方面的不同发展轨迹和社会需求。汉文底本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统治阶级的支持，而英译本的零散性和版本体系的不明确则与西方的宗教多元化及国家政策支持缺位的有关，这些社会历史因素共同塑造了目前佛典英译版本体系的基本格局。

（三）出版形式与大众阅读需求不匹配

在佛典英译本的出版进程中，学术研究和佛教修行的需求是主要驱动力，而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往往被边缘化。19世纪中后期“东学西渐”之风逐渐兴起，从188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日益关注东方传统自然观折射出的独特智慧。20世纪中期，铃木大拙（D. T. Suzuki）和艾伦·瓦茨（Alan Watts）将禅学思想引入西方，禅学中的非逻辑、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二元对立的科学思维方式产生了颠覆性影响。^②可见，西方社会对中国汉传佛教思想的渴求源自西方社会自我革新的普遍诉求。然而，文本译者仅限于英汉皆通的研究者或佛教徒，故现有译本多服务于专业学者和修行者，由此造成了供求之间的不匹配。学术性英译本由知名学者在学术出版社出版，而修行类译本则由佛教团体或个人出版，这些译本通常包含专业注释、梵文词表或修行指导等，对一般读者而言过于晦涩难懂。

在佛教修行类译本中有开经偈、祖师画像、助印功德等，在学术研究类译本中有大量注释、评注、梵文词汇表等。例如，在《六祖坛经》研究类英译本中，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本、菲利普·B. 扬波尔斯基（Philip B. Yampolsky）译本和常亮译本兼有中文校订和文献研究之用，由

^① 参见李婉玉、张政：《汉唐佛经汉译时空分布考：以三部高僧传为例》，《外语教学》2022年第1期，第92页。

^② 参见陈月红：《20世纪禅、道在美国的生态化——兼论对现代科学机械自然观的颠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35页。

圣约翰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等学术性较强的出版社出版。《六祖坛经》修行类英译本多出自佛教修行个人或团体，如铃木大拙译本、美国法界佛教总会佛教文本翻译协会（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 BTTS）释恒隐（Heng Yin）和释恒实（Heng Sure）两版、台北新逍遥园译经院（Neo-carefree Garden Buddhist Canon Translation Institute）释成观译本、中台禅寺翻译协会（Chung Tai Translation Committee）译本和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Fo Guang Shan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Center, FGSITC）译本。

在近200年的演进历程中，佛典英译本谱系交错延绵，或作为学术研究方法，或作为佛教修行依据，服务于各类读者群体。随着佛教在西方的普及，虽译者身份趋于多样化，但译作依然倾向于服务特定读者群体，契合大众需求的去宗教化、弱专业化的译本依然不多。相较而言，此前佛典英译多服务于学术研究和佛教修行，忽视了更广泛的大众阅读需求，使翻译作品的普及性和可接受度受限。

三、破局之策：汉文佛典英译发展建议

汉文佛典英译承载着传播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但在翻译路径、版本体系、出版媒介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应针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为提高翻译质量和推动英译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重视路径差异，加强现代译场话语输出

佛经翻译活动是使异域文化向本土文化靠拢并与之融汇的重要渠道。^①上千种汉文佛典英译本的背后是蔚为壮观、绵延不绝的翻译活动，其中欧美译者译入路径占绝大多数，而出自中国或华裔译者以及汉传佛教僧人创办佛教团体的译本不足百种，译入和译出路径数量相差悬殊，以“他者”视角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解读占据主流，中国译者主动阐释佛典的译本影响较小。在以译入路径为主导的话语传播中，欧美译者对汉文佛典常有误读和曲解，译本一旦进入出版流通环节，这些偏误就很难得到及时纠正。虽然国人译出的版本数量近年来有所上升，但仍远少于英语母语者译入的版本数量。

汉文佛典英译的源头可追溯至明末。彼时，基督教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此后，敦煌文献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方的东方学、汉学和国别研究

^① 参见王福美：《文质彬彬——从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批评看佛经翻译的审美理想》，《民族翻译》2011年第4期，第21页。

的发展,^①西方宗教学者也将东方佛教列入研究范畴。早期译者多为西方传教士,他们通过翻译中国典籍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思想,同时以此为切口了解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以打开在中国传教的通道。^②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一些英国学者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但关注目的仅限于学术研究。^③对以基督教为文化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佛教显然属于异质文化,他们的研究倾向于比较基督教与佛教,对佛教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选择其中自己喜欢的、契合心灵的内容为其所用。^④20世纪中期,佛教研究和翻译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学者成为汉文佛典英译本的译者主力,如扬波尔斯基、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柯立睿(Thomas Cleary)等。美国学者提供的这些译本在服务读者、建构译者身份之余,也为其他专业的读者提供了研究之便,使其学术价值更加凸显。^⑤

20世纪后期,汉传佛教机构加入汉文佛典英译活动,传承中国古代佛经的译场模式,并在人员构成和翻译流程方面与时俱进,逐渐成为汉文佛典英译的主力。例如,美国法界佛教总会佛教文本翻译协会、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中台禅寺翻译协会及台北新逍遥园译经院等机构传承中国禅宗、华严宗、唯识宗及东密正统,为弘传汉传佛法思想持续译出经典。

美国法界佛教总会佛经翻译委员会由释宣化于1970年创办,属中国禅宗沩仰宗,已英译《妙法莲华经》《楞严经》《梵网经》《六祖坛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维摩诘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心经》《大乘百法明门论》《阿弥陀经》等经典。台北新逍遥园译经院由释成观于1991年创办,传承中国贤首宗(华严宗)、慈恩宗(唯识宗)和日本真言宗(东密)法脉,已英译《四十二章经》《金刚经》《心经》《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妙法莲华经》《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六祖坛经》等。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由释星云于1996年创办,承

① 参见朱峰:《汉传佛经西文译本研究指津》,《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81页。

② 参见王佩、许明武:《蒙学典籍〈明心宝鉴〉外译史梳理——兼论典籍外译中的务实性动机》,《民族翻译》2023年第2期,第54页。

③ 参见张政、胡伊伊:《〈佛国记〉英译及文化西传之旅中的“他者”》,《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期,第759页。

④ 参见杨健:《世界佛教通史》第13卷《亚洲之外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⑤ 参见文军、葛玉芳:《宇文所安英译〈杜甫诗〉注释研究》,《民族翻译》2018年第2期,第44页。

袭中国禅宗临济宗，已英译《大智度论》《阿弥陀经》《劝发菩提心集》《金刚经》《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药师如来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中台禅寺翻译中心由释惟觉于2008年创办，同属中国禅宗临济宗，已英译《金刚经》《药师如来本愿经》《八大人觉经》《佛说无常经》《四十二章经》《心经》《菩提达摩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信心铭》《父母恩重难报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浴佛功德经》《六祖坛经》等。

翻译路径的差异导致传播效果的差异。译出路径面临的排斥力量较大，因为译出的动机并非来自译语文化的主动需求，而是出于弘扬自我文化的考量，译语文化可能会放大译文本的异质性。相较而言，译入的动机是汲取他者文化资源，满足自我文化发展的需求。两种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不同，所译文本与目标语社会的关系不同，文本面对的接受度及制约也不同。^① 通过对比不同翻译路径英译语篇的规律性特征，可为汉文佛典英译话语的阐释提供理据。

（二）理清版本体系，提升汉文佛典英译价值

在英译过程中，如果由汉文底本译为英文，同时参照梵文、巴利文和藏文佛典，那么这种同本异译方式便形成了关联交错的版本体系。西方的佛教研究基本沿着巴利文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的路线展开，从事汉文佛典研究的学者较少。^② 汉文佛典曾被认为是梵文佛典的“第二文本”，有人认为，英译佛经应选用梵文或巴利文原典为底本，但汉文佛典也有其独特价值，为比较宗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③ 在梵汉、汉英翻译过程中，先后两次融入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如同棱柱的两次折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④

以《金刚经》的英译本为例，从1864年至2023年共出版英译本34种，其中28种出自汉文底本，22种译自鸠摩罗什本。约1/3的英译本参考梵文、藏文等底本，至少有6种从梵文译出，穆松（Mu Soeng）英译本参考了梵文和汉文底本，乔治·丘里诺夫（George Churinoff）本从藏文本译出，足见其版本体系之丰富。未标注源头底本的其他译本，有待进一步考证。同一佛典

① 参见吕世生、胡茵苒：《中国戏剧对外翻译的目标语文化接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110页。

② 参见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③ 参见班柏：《晚清以降的中国佛典英译高潮》，《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第279页。

④ 参见张政、刘晗：《意义与翻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6页。

的梵文、藏文及汉文本均可作为佛典英译版本谱系研究提供依据，从而对译本内容的准确性进行鉴别。

如图4所示，佛教经典版本谱系的众多文本之间以血脉贯通的互文网络实现文本流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并非简单的线性传承。佛教典籍中的这种前后传承、义理贯通的现象，为佛典英译研究提供了鲜活、具体的材料。因此，在汉文佛典英译实践和研究中，需关注以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为底本的英译本。同源异译关系的梳理和界定，将推动汉文佛典英译的价值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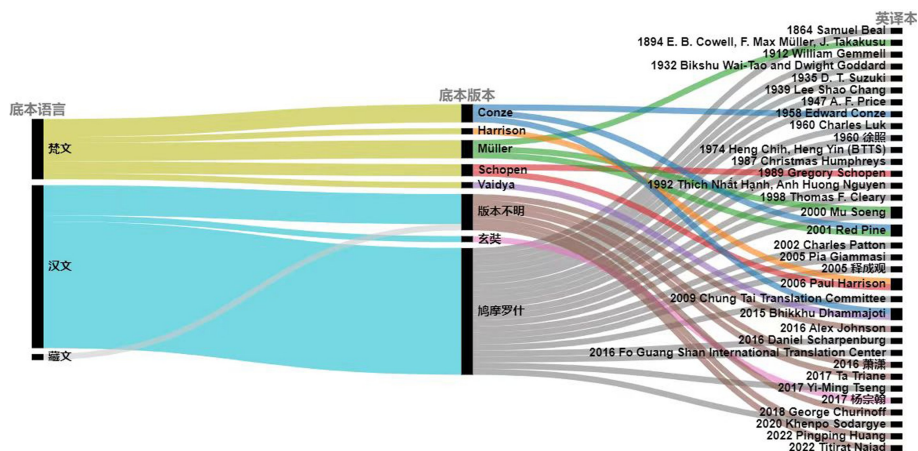


图4 《金刚经》梵汉藏英版本谱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融合出版媒介，推进数字化多模态发布

汉文佛典英译本以纸质出版物为主要载体（包括书籍、期刊、插图图册等），辅之以电子载体（包括电子书、音频、网页等）。译本形态虽然丰富，但是质量尚待提高，而且评价体系明显滞后，无法在短时间内将评价意见反馈至译者或发行机构，导致译文无法得到及时修订。笔者构建的汉文佛典英译数据库资料显示，多数英译本以纸质书籍形式，作为单行本或节译本编入合集出版。另有少数英译本载于期刊或以学位论文形式发表。代表性期刊文章如《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期刊》发表了毕尔译《金刚经》和《心经》、F. W. 托马斯 (F. W. Thomas) 译《解卷论》，以及魏鲁南 (James R. Ware) 译《布施经》等经典。相关学位论文多以佛经英译为主体展开研究，如美国僧人释恒实的博士论文 Sacred Literature into Liturgy: Jingyuan (1011 - 1088)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vatamsaka Liturgy in Song China [《从圣典到礼仪：净源法师 (1011—1088 年) 与中国宋代华严忏法的发展》] 中便包含了《普

贤菩萨行愿品》的译文（Chapter on Entering the Inconceivable Liberated State of Samantabhadra's Practices and Vows）。以期刊文章或学位论文为载体发表的译本，因年代久远或发行范围较小，故之前甚少被研究者关注。这种形式可作为汉文佛典英译出版的有益补充。

纸质版译本的优势主要是质量较高，特别是学术机构出版的英译佛典规范程度较高。相较而言，综合性出版机构的译本水准参差不齐，如在 Amazon 等销售平台可获取的电子出版物和转置音频存在内容缺失、随意删减等问题。佛教团体在出版纸质译本的同时，还提供网络阅读和下载渠道。佛教团体有弘法信念，以至诚之心翻译和制作译本，对佛理的解读较为权威。例如，在释宣化创办的佛教文本翻译协会网站上有排版精美的单行本可供下载，他也曾将译本分期连载于美国法界佛教总会会刊《金刚菩提海》，并优先译出重要经典，如《心经》《六祖坛经》《永嘉证道歌》等。

可将汉文佛典英译的演变特征概括为从期刊连载到整本发行、从学术研究到大众阅读、从纸质媒介到数字媒介，文本数量的急速增长带来了话语传播热度的提升。Amazon 读者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读者不具备双语阅读能力，仅能阅读英译本，一旦译本承载的话语内容出现偏差，读者便无从判断，易被误导。佛典英译多模态发布是大势所趋，特别是音频、图册、网页版的轻量化传播势在必行。目前，相关的核准和监督机制严重缺失，研究者尚需开展系统性的译文质量评价工作，为译者、出版社和读者提供专业性反馈。

四、前瞻之道：弘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

在新时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进程中，汉文佛典英译活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① 汉文佛典蕴含的中华文化体现在其倡导的慈悲为怀、和谐共生、智慧觉悟等理念中，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平等、公正等基本原则相契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文化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其在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慈善公益、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能够为社会大众提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64 页。

供精神文化资源。^① 在儒家、道家、佛家相融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汉文佛典对中西文化互鉴的贡献不容忽视。季羨林先生认为，可以用东方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狭，这就是“东西文化互补论”。^② 作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汉文佛典英译工作承载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需要系统地翻译和出版高质量的汉文佛典，以学术研究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以数字化传播手段扩大其影响力。

汉文佛典英译活动有近 200 年历史，形成译本上千种，已颇具规模且仍在持续发展中，但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伟愿景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在英语世界中，系统介绍中国佛教的作品并不多见，有关中国佛教的专业术语表达也缺少统一规范。^③ 究其原因，一是中西文化内核存在显著差异，汉文佛典蕴含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对西方读者而言理解难度较大；二是译出路径所需的翻译专业人才匮乏；三是佛典英译本体系化梳理任重道远；四是市场化和大众化传播渠道不通畅。面向未来，必须建立翻译标准，深化学术研究，明确传播机制，拓宽交流渠道。本文以数字人文方式助力人类瑰宝的“西传”赓续，通过数据库建设和计量分析为佛典英译研究提供数据与思路，为该领域翻译实践与研究提供启示和建议，以期为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实现文明之间“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景作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延 缘)

① 参见圣凯：《中国佛教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与界限》，《佛学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3 页。
② 参见季羨林：《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5 期，第 5 页。
③ 参见范文丽：《〈中斯佛教百科全书〉撰述及其知识社会史意义》，《世界宗教文化》2018 年第 6 期，第 132 页。